

湖南古代书院及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谭曙光¹, 胡弼成²

(1. 中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3; 2. 湖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书院在其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传统。从湖南古代书院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书院的教学特点、教学管理及制度等方面进行研究, 可以获得如下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确立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理念; 大师执教才有一流大学教育;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重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学管理。

[关键词] 湖南; 书院; 大学教育;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5) 01-0009-04

书院在中国文化与教育史中居于重要地位, 是中华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从唐末到二十世纪初年,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古代书院, 一直弦歌高奏, 兴学不断, 走过了千余年的风雨历程。一种制度能够持续如此之久, 而她培养的人才中又有那么多文化先贤、民族精英, 其教学不得不引人深思。

一、湖南古代书院教学及其特点

1. 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培养目标是教育目的的延展和具体化。在教育上居支配地位的宋代官学教育, 把培养统治阶级子弟入仕为官作为学校的唯一使命。立教育人的学校变成了利禄之路和进身的阶梯, 失去了育人的本意。然而, 岳麓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全面审视和批判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目的。概而言之, 即是“传道而济斯民”。对此办学目的, 张栻曾这样论述道: “侯之为是举也, 岂特使子群居佚谭, 但为决科利禄计乎? 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 盖欲成就人才, 以传道而济斯民也。”^[1]

在此目的下, 书院提出了自己的人才培养模式, 这也是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此目标张栻曾作了概括, 指出其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其一有明确的正确方向, 有修齐治平的大志。“考先王之所以建堂造士之本意, 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 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 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事甚在矣。”^[1]

其二, 儒生应有明确的人生目的, 以“致君泽

民”为自己人生目标, 有为天下而献身的精神。

其三, 儒生必须具有亲民爱民的胸怀, 以护养邦民为职志的精神: “儒者之政, 一一务实, 为所当为, 以护养邦民为先耳, 此则可贵也。”^[1]

以上三点就是张栻所设定的伦理道德型的人材模式。这恰好是历代所认定的儒生本质, 或者说是界定儒生的标准。

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 清“湘人无人不景仰”的欧阳厚均也有自己的主张和目标。他把书院所有的教学活动概括为“以薪培植人材为有体有用之学”和“不徒区区文艺之末也”(《岳麓课艺三集序》)。学生既要掌握儒家经典, 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纬国之材, 而且要学习人伦日用方面的知识, 具有应变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欧阳厚均认为, 只有“体”和“用”相具备的人材, 才有可能“出为良臣, 处为良士”, 而不是只会低头吟诗的迂腐, 也不是不懂立世传道的纨绔弟子。

课程是达到培养目标的具体途径。在课程设置上, 书院有“定本”。朱熹曰: “圣人教人必有定本。”那么书院所选择的定本是什么呢? 是儒家经典。理学家特别推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称为“四书”。《四书》是关于做人的学问, 对如何做人和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作了系统的论述, 是名符其实的“人学”。又特别重视《诗》、《书》、《礼》、《易》、《春秋》, 称为“五经”。一般书院都是先读“四书”, 进而再读“五经”。可见, “四书”、“五经”是历代书院通用的基本教材。

除“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外, 宋、明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 也都是书

[收稿日期] 2004-09-07

[作者简介] 谭曙光 (1971-), 男, 湖南岳阳人, 中南大学高教所 2003 级高等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院教学的重要读物。如朱熹的《小学集注》、《近思录》和《朱子语录》，记录王守仁与学生论学问答语的《传习录》等，都是书院学生的重要学习材料。

2. 书院的教学特点

书院的发展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其教学情况，也是因不同的时期而有所变化。但从总体来看，书院在教学上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现将其主要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书院产生之初，是学术研究机构，只是官方藏书、校书之地，而非“士子肄业之所”。到五代末期，书院开始从私人读书之地发展成聚众讲学的教育机构。两宋时期，书院相继创建，出现了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著名的书院，而且随着印刷术的普及，书院一般都拥有较为丰富的藏书。于是，书院也就有了如同季羨林先生所指出的“特点”，即“在个别著名学者的领导下，积聚大量图书，聚众授徒，教学与科研相结合。”^[2]

从此以后，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始终贯穿于书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科研的深化促进了书院教学向纵深发展，而教学的普及与拓展又反过来推动了科研成果的传播，促进了科研的进一步深化。教学与科研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机制。

第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书院不同于官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具有自由讲学的特点。南宋时期，岳麓书院就是一个开放性的教育基地，各个不同学派的学者均可以在这里讲学，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派、以陈傅良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等，均在岳麓书院讲学。尤有特点的是，岳麓书院最早出现了“会讲”制度，即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学派聚会讲学，相互辩论。并且在这种学术论争中相互启发、相互汲取。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崇安来到长沙，在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两章，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在《中庸》的“中和”问题上，他与张栻讨论十分热烈，留下了“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的记载。书院的讲学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因而讲学较为灵活、宽泛和自由。

南宋时期，不但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他们能够并且乐意接受不同学术观点的老师讲学。岳麓书院的一些著名学生，均能够从学于当时观点不同的学术大师，如胡大时就跟随了张栻、朱熹、陈傅良、陆九渊问学，沈有开曾求学

于张栻、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蒋元夫从学张栻、陆九渊等等。

第三，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讲授为辅。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研究能力，要求学生加强自学环节。书院给学生一定的指导后，学生如何学习主要靠自己。朱熹认为教师只是学生的“引路人”，“证明人”，只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3]

教师的讲授一般是用少而精、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或选取重点，着重发挥，阐明精义，使学生领悟义蕴；或指定书目，令学生熟读精思，细心思索，教师从旁指点；或反复质疑诘难，解答问题，师生共同讲习、论辩等。

第四，尊师爱生，情谊深长。书院中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这个优良传统，在当时的官学中是很少见的。朱熹曾指出：“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官学中师生关系之冷漠，由此可见一斑。与此相反，书院教师大多能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对学生充满深情。《朱子年谱》记载了朱熹为师的热心及其与学生的融洽关系，“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实务，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恩恻至到，闻者感动。”

书院生徒一贯尊师重道。他们从师，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做人。他们对教师的感情很深，从学术到生活，从生养到死葬，都有极为动人的事例。例如，王守仁死后会葬时，门人远道而来者多达一千余人。他的大弟子钱德洪、王畿、王艮等还守“心丧”三年之礼。

3. 教学管理及制度

书院的教学管理，通过学规及其实施表现出来。学规，也作学约、学则、学箴、规约、训练、训规、讲规、会规、揭示、开示、院规、堂训、堂规等等，名目繁多。书院学规最早见于宋代，最有名的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在《揭示》中阐明了理学教育的宗旨，明确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的理学教育思想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

宋理宗皇帝曾手书赐示国子监诸生，并颁行地方府州县学及书院。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

岳麓学规较具代表性的还有清代山长王文清制定，至今嵌在岳麓书院讲堂右壁的《岳麓书院学规》，这一学规对书院的教学管理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湖南古代书院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启示

岳麓书院半学斋门联为“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此联其实高度概括了湖南古代书院千百年来在培育人材方面的地位与作用。回首千年史，我们眼前涌现出了一代代炳耀史册的人材群体：“一时之英才”吴猎；忠鲠之臣彭龟年；开禧北伐功臣赵方；锐志当世的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不可否认，湖南古代书院，之所以培养出那么多“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的教学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方面的宝贵经验，对于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1. 确立以人为本的大学教育理念

湖南古代书院的山长们，严厉批评官学教育，指责他们把学校变成了利禄之路和进身的阶梯。在此基础上，这些山长们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念，强调教育必须以人为本，突出了以德育人和对人性关怀的人文精神。

岳麓书院的首届山长周式，以行义著，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张栻主讲岳麓，一开始就大讲公私义利之辨，为学进德之序；清代著名山长罗典，在教学中紧紧抓住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4]八个字；罗典同时代的山长贺长龄也提出要把品德道德的教育放在首位，“真才必从德出，则其才乃为有用”。^[5]更可贵的是这些山长们都认真地践履道德，言传身教，既为经师，又为人师。文天祥在祭他的老师欧阳守道时称赞备至，说：“先生其真如赤子，其慈如父母，与人相处，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就很难造就湖南古代书院的辉煌。检视书院的史迹，我们会发现：从书院的办学宗旨到人才培养目标，从教材内容的精选到学规的制定，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整个教育过程都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同样，没有现代大学理念，怎么谈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一流大学教育？我们年年打出大学排行榜，一些高校也纷纷提出早日跨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宏愿。而创建一流大学，首先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指导。办学理念对办学起着定向的作用，这对学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重新确定大学的理念是首要的任务”。

非常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高等教育一直是“行政治校”，致使高等教育

界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不足，即：轻视高等教育理论和办学思想的指导作用。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是不平衡的，特别是从创建一流大学的高度来审视，差距就更大了，需要我们奋起直追，尤其是处于决策层的人们，更需要在确立高等教育理念的问题上下硬功夫、真功夫、苦功夫。

2. 大师执教才有一流大学教育

湖南古代书院的师长们，都很注重学术研究，都有其学术专长并自成流派，并出现了不少大师级的人物。一千多年来，岳麓、城南书院的教师中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称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学大师们。这些先贤中，有不愿京都做官、执意民间教育的北宋学者周式；有在群星灿烂的南宋被称为“一代学者宗师”的张栻；有“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的朱熹；有胸怀经世宏愿的“事功学派”巨子陈傅良；有发现“良知”奥秘并掀起一代学术思潮的王阳明；有力挽狂澜、希望拯救明末士风的东林学子高世泰；有潜心诂经考史的博学之士王文清、王先谦等。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每一种思想都可击节赞叹。是他们这些一流的大师成就了一流的教育。

没有大师，湖南古代书院的书声不会在清溪茂林间回荡上千年；没有汇聚那么多的海内名师，也就不会培养出那么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天下英才。

当前我国大学，尤其是一些著名大学，力争“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但其中却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现在的大学里，究竟有多少大师级的人物（不管是人文大师，还是科学大师）？虽然在“长江学者计划”的推动下，一些大学已经开始学会面向世界，面向全国高薪招聘杰出学术人才了。但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的教师任用缺乏公开性、竞争性，以及缺乏一整套国际化用人机制。我们不能忽视大学是“历史遗传”产物的事实，但我们更要明白，决定大学能否快速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是教师中的精英——大师！

3. 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

官学教育一般都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因而官学大多是文凭主义、考试主义，学而后为官，唯为官一途。因此，学术上无交流，感情上也平淡。但书院自产生之日起，名师教学都注意诲人不倦，师生间以诚相待。在此基础上，书院形成了“以人格感召和学问吸引为基础的超功利的师生关系”^[6]。书院一直认为，“圣贤”的学问只不过是“众人”学问的集大成，将“圣贤”与“众人”这种师生关

系明确摆到了平等的位置。并且,这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在书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被湮没过。

书院凸现师生关系的民主平等性,是对传统师生关系的反思与挑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其核心是要求人们把师生看成是完整意义上的“人”,而不是“物”;教师与学生之间不是对象性的主客体关系,不是买卖性的钱物关系,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交往关系,即“主——主”关系或“我——你关系”。师生之间只是知识的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关系,二者并不存在尊卑之分。但教师的作用没有被抛弃,而是得以重新建构。

当今一些大学,以“教师为中心”的关系还占主要地位,学生的教育生活被化简为一种知识学习的内容,而精神的发展处于自发的状态。这种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把学生看成是控制和教育的对象,学生不能积极地投入到师生关系的创造和教育活动中。因此,古代书院那种“学问须大家帮扶,相推相引,相渐相摩”的师生关系,认真思量,细细品味,也许能给我们现代大学带来某些启示。

4. 重视具有人文特质的教学管理

湖南古代书院的管理模式比较独特。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老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不过,学生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抽查。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1840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屋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在这种气氛中,书院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远非官学所能比拟。早在宋代,长沙一带就出现了三个公认的教学等级:“潭州三学”。“三学”的最早记载见于《宋史·尹谷传》。明代所编《岳麓书院志》的记载则较详备,其谓:“宋潭士日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试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生;又积分高等,升岳麓精舍生。潭人号为三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湘西书院颇有点像本科院校,而岳麓书院则有点像研究生院,高标独立,引人仰望。

由于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大学管理者一般崇尚刚性管理,这种管理方式表现在当前大学教学管理中,就是过于偏信、偏重制度或经验管理。“如果我们细想一下,难道这种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方式,就没有使我们在精神文明方面蒙受损失吗?回答是肯定的。这与任何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进步一样,其伴生的负效应显然是不容忽视的。”^[7]这种管理使“高等教育成了无‘人’的教育,高等教育现代化丧失了本体性内涵和立体性追求,沦为‘工具’。”^[8]学生受的约束较大,不能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容易引发一些不满因素,导致教学工作处于被动局面。

当然,关于大学的管理问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是一个需要真正作为学问认真细致地加以研究的问题,最好不要在现成的口号中去求证,而要进行实证的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这一研究中最首要的原则,虽然坚持这一原则很难很难,但是别无他途。

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湖南古代书院,作为正规官学与私学的补充,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书院的教学模式,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四”时期,为了促进当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书院,曾兴盛一时。今天,为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建构,笔者呼吁读者诸君共赴这一研究领域。共同的研究或许可以借鉴曾经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宋·张杖.南轩集
- [2] 季美林.论书院[A].中国书院(第一辑)[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 [3] 顾树森.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 [4] 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 [5] 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8.
- [6] 朱永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 [7] 杜作润,高锋煜.大学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 [8] 张应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反思与建构[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赵惠君)